



中国现代各体文学理论经典



中国现代散文 理论经典

周红莉 / 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各体文学理论经典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经典

周红莉 编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经典/周红莉编.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8. 1

(中国现代各体文学理论经典/曹培根, 丁晓原主编)

ISBN 978-7-81137-021-8

I. 中… II. 周… III. 散文—文学理论—中国—现代
IV. 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3003 号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经典

周红莉 编

责任编辑 史创新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 常熟市元和路 98 号 邮编: 215500)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53.125(共四册) 字数 1328 千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7-021-8 定价: 96.00 元(共四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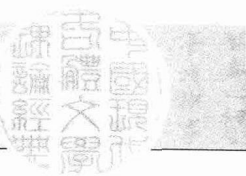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35

目 录

导 言	(1)
《国朝文汇》序	黄人(黄摩西)(14)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17)
我之文学改良观(节选)	刘半农(21)
人的文学	周作人(29)
怎样做白话文	傅斯年(37)
清代学术概论(节选)	梁启超(49)
美文	周作人(52)
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	许地山(54)
纯散文	王统照(58)
散文的分类	王统照(60)
《赤都心史》序	瞿秋白(69)
《剑鞘》序	俞平伯(71)
读者的话	叶圣陶(73)
絮语散文(节选)	胡梦华(76)
小品文(节选)	夏丏尊、刘薰宇(79)
《恹恹》序	徐蔚南(85)
怎么写	
——夜记之一	鲁 迅(89)
《杂拌儿》题记(代跋)	周作人(95)

《朝花夕拾》小引	鲁 迅(97)
论散文	梁实秋(99)
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	朱自清(104)
试谈小品文	钟敬文(109)
《燕知草》跋	周作人(113)
《小品文选》序	梁遇春(116)
古文的演变与新文体的发生(节选)	陈子展(120)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冰 心(128)
什么是小品文	李素伯(130)
《冰雪小品选》序	周作人(138)
《近代散文抄》跋	俞平伯(141)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节选)	瞿秋白(144)
《达夫自选集》序	郁达夫(150)
论小品文	徐仲年(153)
小品文的危机	鲁 迅(155)
散文随笔之产生	方 非(158)
《近代散文抄》新序	周作人(167)
发刊《人间世》意见书	林语堂(169)
《半农杂文》自序	刘半农(171)
论小品文笔调	林语堂(174)
论文(下篇)	林语堂(178)
关于小品文	茅 盾(183)
说个人笔调	林语堂(185)
情绪的体操	沈从文(190)
论现代中国散文	孙席珍(194)
小品文之遗绪	林语堂(201)
《现代十六家小品》序	阿 英(207)
小品文杂说	周木斋(213)



关于小品文	叶圣陶(218)
小品文的前途	王任叔(222)
小品文往哪儿走	陈醉云(224)
梦与小品文和漫画	孙良工(227)
关于小品文	许钦文(229)
由雅人小品到俗人小品	伯 韩(235)
《空山灵雨》弁言	许地山(240)
《谢冰心小品》序	阿 英(241)
娓语体小品文释例——小大辨(节选)	陈叔华(244)
《小品文续选》序	梁遇春(249)
什么是散文	朱自清(252)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周作人(255)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节选)	郁达夫(272)
杂谈小品文	鲁 迅(291)
《未厌居习作》自序	叶绍钧(293)
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295)
论性灵	林语堂(301)
扇上的烟云(代序)	何其芳(305)
《背影》序	朱自清(308)
清新的小品文字	郁达夫(313)
论小品文	
——一封给《天地人》编辑者徐先生的公开信	
.....	朱光潜(316)
《文章例话》序	叶圣陶(322)
《黄花苔》序	芦 焚(师 陀)(326)
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	何其芳(328)
重振散文	丁 谛(337)
现代散文的道路	林慧文(340)

暗夜棘路上的里程碑

——“孤岛”一年来的杂文和散文

..... 唐 弢(347)

略谈散文

——《散文选》序 葛 琴(354)

杂文的路 周作人(358)

《山水》后记 冯 至(363)

关于散文写作

——答《文艺知识连丛》编者问八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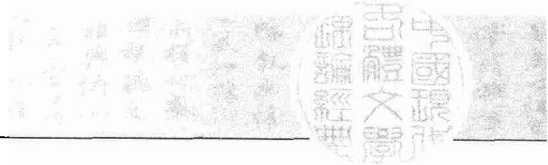
..... 叶圣陶、朱自清、唐 弢(366)

谈散文 李广田(374)

我和散文

——《还乡杂记》代序 何其芳(377)

后 记 (385)



導言

一

在中国文学史的构建中,散文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体是不可或缺的。从先秦诸子到两汉史传,继之唐宋“八大家”高标文坛,后承明之“七子派”、“唐宋派”、“公安派”,清之“桐城派”等等,其文类包罗万象,书、记、碑、铭、论、序等均以散文体类为存。但作为一种自觉意义的文类,散文是相当滞后的。若从“散文”的发生看,为“散文”正名者,各有其词:有论者认为,“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从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正如郁达夫自己所声称的是“臆断”一样,散文的源起未必真是如此);有论者认为散文与佛教有关,《宋高僧传》卷三《唐大圣千福寺飞锡传》可见“今所译者多作散文”

语;有论者认为,散文始见于《文选·海赋》中的“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绫罗被光于螺蚌之节”……可谓各执一词。若从散文体式的角度勘探,则可追溯至南宋散文家周益公(必大)的“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但周益公对散文体未作具体诠释,仅是点到为止。至于《文心雕龙》中论及文体分类,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散文)之说,也只是从音韵的角度对文体作了大致的划分。因此,作为一种界域宽泛无定的古老文体,散文理论资源匮乏难堪,在传统文论中,只是被宿命般地留下片断式、印象式的语焉不详的言说,如李贽作“童心说”、“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有“性灵说”等。这种尴尬局面的打破当是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后。梁启超在“欧西文思”的蛊惑下,提出被老辈痛恨为“野狐”的“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新文体”导入了如黄人所说的“欧和文化”(《〈清文汇〉序》),由此为散文文体由封闭、单一的古典形态向开放多元的现代形态转型提供了可能。而在那个解构与建构的时代,“‘五四’作家种种的散文命名,反映出了他们对散文属性的体认和理解,形成了现代散文的基本范畴和文体要旨,为20世纪中国散文理论批评设置了一个具有一定高度的逻辑起点”(丁晓原《现代散文的命名与释义》)。自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散文与散文理论建设进入它“绚烂极了”的“命名”时期。

提及现代散文理论的发端,我们自然无法绕开周作人与其《美文》(1921)。诚如孙席珍所说,“讲到现代中国的散文,周作人先生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物,我们首先不能不感谢他的提倡的功绩”(《论现代中国散文》)。周作人引进的“美文”概念及其随笔式的讲述,为现代散文理论拓展了新的疆域。而这种新疆域的开启并非是种创造,实是明代公安派“无视古文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亦即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之再生的产物。但也不仅宥于此。周作人在《〈燕知草〉跋》里说道:“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无



论是承继传统还是借取西洋,1922年的胡适清醒地看见“白话散文很进步了”,“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所说的破除“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特指向周作人所强调的“美文”的文学属性,即美文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但事实上,关于文学散文之表意,肇始者并非周作人。刘半农早在《我之文学改良观》(1917)中便提出“文学散文”的名称:“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而“文学为有精神之物。其精神即发生于作者脑海之中。故必须作者能运用其精神,使自己之意识情感怀抱,一一藏纳于文中”。虽然刘半农的“文学散文”还包括着“小说”及“杂文”在内,但其所指(包括“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的倡导)使现代散文向着“文学”挪移迈出了颇有意义的一步!傅斯年也在《怎样做白话文》(1919)中把散文概念解说为“广义的散在文学”。此后王统照的《纯散文》(1923)、胡梦华的《絮语散文》(1926)等也都同一地指向散文的文学特性,并且作了若干具有关键性的提升。换言之,在现代散文理论的发轫期,文学性便已作为散文重要的本体性特征得到了充分的关注与彰显。而这文学性的根本特质,又无一例外地指向了“人”,即周作人在1918年所论说过的《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周作人对此有一明晰的注释:“用这人道主义之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我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从个人做起”,“人的文学”要“发见‘人’”、“‘辟人荒’”。文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表现“人化”的存在,而散文是人性景象中最直接的语言现实。透视“五四”以及以后30年代的散文理论话语设置,大都烙着人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因素。

譬如郁达夫。郁达夫以为散文第一要义便是找寻“散文的

心”。古之“散文的心”是“尊君、卫道与孝亲”，由此衍生，“行文必崇尚古雅，模范须取诸六经；不是前人用过的字，用过的句，绝对不能任意造作，甚至于之乎也者等一个虚字，也要用得确有出典，呜呼嗟夫等一声浩叹，也须古人叹过才能启口”。可见，古之文心大约是“他者”之心。而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在于“表现的个性”。郁达夫所谓的个性，原指个人性 individuality 与人格 personality 的两者合一性而言。他对周作人关于“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看云集》）的揣测与解说，基于的便是“王纲解纽的时候，个性比平时一定发展得更活泼”。生长着个人性的“人”的确立成为郁达夫解读散文的首要条件（《〈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林语堂也是一个专心于散文文学本体功能探讨的有为者。他的《发刊〈人间世〉意见书》其实就是一个关于小品文写作的林氏宣言：“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只有闲适之笔（“闲谈体”或“娓语体”），方可“语出性灵”（《论小品文的笔调》）。林语堂还倡言散文的性灵，以为“性灵就是自我”，“文章者，个人之性灵之表现”（《论文》）。概言之，“性灵即个性”，“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以此个性 personality 无拘无碍自由自在表之文学，便叫性灵”（《论性灵》）。相对而言，叶圣陶的散文理论主张较为具象化，他要求的是“我”在“我”写，意在表现自己：“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意见一个主张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的人的。”在叶圣陶这里，散文作者所写的“话语”，正应该是“你们的心的独特的体相”。这与劳伦斯的“为我自己而艺术”相通，也类似于他自己在《关于散文写作》中所说的“自得（君子无人而不自得）”以及朱自清的“感兴”，强调散文当说“自己的话”，“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致力于表现自我心灵。至于认为“一切的散文都是一种翻译”的梁实秋，他最为关注的则是思想、情绪、想象如何转化为语



符。他自创了“文调”一说,以为文调是自由的、个人的:“散文是没有什么格式的,是最自由的,同时也是最不容易处置。因为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提出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的性格纤毫毕现的表示出来。”(《论散文》)梁实秋的论说与胡梦华认定的散文是“茶余酒后的闲谈”,其“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絮语散文》)表述相吻合。而鲁迅叙说的“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怎么写》),与朱光潜之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独到”,“无论是个人的性格或是全民族的文化,最健全的理想是多方面的自由的发展”(《论小品文》),指涉的仍是个体与文学自由的话题。由此可见,从散文文学本体出发,灌注自由书写的精神意志,是现代散文理论耕耘者所密切关注并津津乐道的。

但是,过度强调散文本体特征与主体自由心志关联的言论,在某种意义上淡化了(客观上也疏离了)散文(更多的文本都用“小品文”为表述对象)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另一种的片面。正如刘半农在《半农杂文》中论述到的:“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人的社会属性,相对地决定了他无法从社会中完全剥离。刘半农所说的“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杀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他试图建立一个人与社会的共存空间,即所谓的个人与公共的关联共生的关系。若散文与散文理论实际果能如此,朱光潜便没了“猛然深深地觉到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时代环境间的离奇的隔阂”(《论小品文》)的那般慨叹,许杰也不必大声疾呼“做小品文,我想,也应该同做人一样,第一要活着,第二要有骨有肉,第三要有现代的社会意味”(《小品文的社会风格》)了。在散文这一特定的话语场,我们的散文理论,并非只要停顿在“闲适”上,或者停顿在“大话家”的舌头上(唐弢《小品文拉杂谈》),文学的个性意识与时代使命,应自然发生某种链接,确认某种关系。我们所要关注的

重心在于如何于“小”中洞见或是个人的情趣或是人生的真实或是社会的镜子(陈叔华《娓语体小品文释例——小大辨》)。但事实并非如此。非此即彼的“小品文”论争尘嚣 30 年代初的散文界。一群立足于现实的社会背景,意在做足散文的社会功能与战斗功能的散文议论者,对个人与自由的散文表示了严重的不满。鲁迅一方面抨击那些只可供士大夫“清玩”的“小摆设”小品文,提出“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的论点,一方面也并不否认小品文的愉悦功能,但强调的是“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前的准备”。在当时那种“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时代,小品文“只用得着挣扎和战斗”。方非更是将那些战斗性不强的随笔或小品文直接定性为“软性读物”,即短小成章、无所不谈、格调伤感、旁敲侧击、即物言志诸类文字(《散文随笔之产生》)。这样的命名,表达了命名者对所指显见的不满与对散文社会价值的另一种诉求。茅盾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主张在“小品文”前冠以“新”字,主张以“五四”时代的“杂感”和“随想录”为新小品文的基础,使其成为“新时代的工具”(《关于小品文》)。与此相呼应的是王叔明的《我们需要怎样的小品文》,直接将小品文的作用设定为“积极地站在动的观点上去干涉和批判这个社会”,应和着鲁迅倡导的“匕首”与“投枪”的功能。另有一些散文说者忧虑着“小品文往哪儿走”(陈醉云),发表着对于小品文的意见:“提倡什么闲适幽默潇洒轻松的‘个人笔调’,借小品文来逃避现实,因之使小品文变成无用无力的东西的企图,是应该受到指摘的。”(聂绀弩《我对于小品文的意见》)针对这种普泛质疑小品“闲适”取向的态度,也有另类的声音存在,比如周木斋在《小品文杂说》中提出:“我以为现在小品文的滋长,正是不闲适的表示。”伯韩在“个人主义的闲适小品”与“匕首”之间寻得一条路径,即“能够说出大众心坎儿上的话”的“俗人小品”、“生活的小品文”(《由雅人小品到俗人小品》)等。

现代散文理论批评于晚清发生,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在并不太长的时段里,积累的各家诸说可谓是琳琅满目,但大抵可归入文学史家阿英所概括的两种基本倾向,即“战斗”与“消沉”(《〈现代十六家小品〉序》),前者强调的是它的社会价值意义,后者则是指说它归于个人的人本取向。此种归纳虽流于简单、机械,但其勾勒的形态倒也是现代散文理论史上一种真实的存在。无论是“战斗”,抑或是“自得”(“消沉”),都需要主体具有自由的精神。“战斗”是以独立的姿势向社会发言,而“自得”又是以从容的心态经营个人生活。此两者都有着不同以往的新向度,人称“散文理论的新范式”,其意义正如言者所论:“散文理论新范式的确立,所体现出的革命性维度,既针对传统散文范式的功利化、工具化,更以对现实的否定性批判为指向。新范式在张扬个性之际提出以执卷旁观的超越和自在旷达的闲适为散文的精神向度,这两种品质的重要性在于维护散文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避免散文在文化启蒙运动中弘扬的文化批判性沦为实用性和工具性的危险;同时倡导散文应有的方式,是从‘无用的优游与享乐’而来的闲谈,认为这用生命的余裕絮语人生的方式,由于超越了外在的压力而是心灵的放松和个人思想的表达,才可能拓辟出现代散文的文化创造精神,……闲谈与文化发达的绾合是现代性散文理论反复提倡的‘闲适’之根本旨趣所在。可以说它是在主体性理论激发的独立自由精神的酿造中,所作出的关于散文精神的深层设定和散文美学的趣味追求。”(蔡江珍《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由此可见,现代得之于散文两种志向的种种言说,都是值得我们给予重视的。

二

鲁迅早就指出:“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

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选本》)用选本的形式显现关于文化、文学、历史的动态过程,寻访逝去的文字,存活过往的时空,大约就是我编《中国现代各体文学理论经典·散文卷》所试图抵达的。考查已有的散文理论选本,如俞元桂的《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王锺陵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等,其入选的文本更多地具有通式性的表征,即选录在文学史中已达成共识的有着显性的历史影响的理论主张,或者是有着强烈时代特征与预见性的文论主张。这些关涉散文的话语大多已演化为一种理论批评的范式被后世反复征引、阐述与论证。而我感兴趣的并非只是这些显在的通用性文论,我更多地注目于历史框架中那些曾被遮蔽了的若隐若现的有着鲜活主体声音与个性表述的文字,其中一些深含意蕴的表说大都以非系统、非显性的形态或是以序、跋、书信的方式存储在历史的幽蔽处。我在进行编选时,既注意选录公共性的显在的通式性文本,也注意用另类的个人眼光将通常看来似乎并不直接旨归散文,但对散文的源流辨析有着启示意味、对散文理论建设有着发端意义的(即便是只言片语的)文本录入选本。

如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节选。在梁启超的意域中,采入“欧西文思”,创造别于古往的“新文体”,是其人生的大使命。对此他很自得:“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启超在这里并没有对“新文体”做直接的界说与细论,但我们从他这段自以为然的描述中,可知其中的一些新质。“新文体”实为一种“解放文体”,它的“解放”、“平易畅达”、杂语表达、纵笔无束、笔锋带情等,正昭示了现代散文若干新的品质。而梁启超所

力倡的“文界革命”，既基于自己对“新文体”的操练所得，也受之于域外新文风的刺激。梁启超是身处日本反观中国文坛时提出“文界革命”的倡议的：“余既戒为诗，乃日以读书消遣。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开一别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在梁启超看来，散文要别开生面，就要有赖“革命”，而灌注“欧西文思”，导入异质的现代精神品格显然是十分必要的。这里的“欧西文思”实与梁启超有关“新文体”的表述是相应合的。这些零散之语，倒也描画出了中国散文走向现代的依稀轨迹，因此显示着重要的价值。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我选录的另一重要文论。一般而言，此篇是公认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它直击旧文学弊端，呼吁新文学建设，所论的是整体性的文学革命，似乎并不特指某一具体文类。但通释文本，我们可以发现陈独秀指说旧文学的种种不是之时，大多是以散文来说事的。堪称典范的唐宋“八大家”在陈独秀那里被消解：“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由此，陈独秀以为中国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久矣，在他看来，这可归根于韩愈诸人。而“文犹师古”，不说自己的话，散文就成为了主体的空壳，用周作人的话说：“可笑千年来的文章道统，不过博得几种窠臼而

已。”(《〈近代散文抄〉跋》)从陈独秀的这些言说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他对散文正面的主张,即散文应操守主体独立的思想,书写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

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3)与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1927)历来为研究者青睐与广泛征引,被视为对现代散文作权威总结的样本,而对陈子展《最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学》(1930)中关于散文的表述似乎有些视而不见。实际上,陈子展的著述中对晚清至“五四”诸家散文及其形态多有扫描,并且有不少相当精彩的论评,如对“语丝”体的概括:“在这些作品之中,有清淡的飘逸的抒情文,有辛辣的深刻的批评文,而以后者最富于俏皮的言语和讽刺的意味。所谓‘语丝文体’,可为这种文的代表。”我以为,陈子展对散文的这种论述是很得其大体的,在散文史总结方面所体现的价值也是不逊色于胡适与朱自清的。

另有一些撇开浮泛的散文文体论争,聚焦到具体的“小品文的作法”(即创作论)的文论,也是我关注的对象(即便整篇文字一般,但其中有闪光处,也值得我们看重)。如徐蔚南的“印象的抒写”、“暗示的写法”、“取材常采取即兴的一点”(《〈憧憬〉序》)的散文作法与许地山在《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中倡导的“三宝”(即智慧宝、人生宝、美丽宝,此为创作界的“三位一体”)、“四依”(即依义、依法、依智、依了义)互为回应。如郁达夫在《〈达夫自选集〉序》中明确的“散文清淡易为,并且包含很广,人间天上,草木虫鱼,无不可谈”的作法与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强调的“上自生死兴衰,下至虫鱼神鬼,无可不谈”,散文的语言“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可为互通。梁实秋则从散文的艺术计量出发,认为散文艺术的最高理想是“简单”二字,其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割爱”,“散文的美,美在适当”(《论散文》),这与周作人的“只是真实简明便好”(《美文》)、刘半农的“我以为文章是代表语言的,语言是代表个人的思想感情的,

